

我们搞文化建设，
不能脱离无比深厚的
民族土壤

姚雪垠



文化名人人生智慧丛书

蒋 晔 武京予 著
河北人民出版社

文化名人人生智慧丛书

姚雪垠

蒋
晔

武京子
著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姚雪垠人生智慧/蒋晔,武京予著. —石家庄:河北人民出版社,2008.9

(文化名人人生智慧丛书)

ISBN 978-7-202-05012-5

I. 姚… II. ①蒋…②武… III. 姚雪垠(1910~1999)—人物研究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30929 号

书 名	姚雪垠 ——文化名人人生智慧丛书
著 者	蒋 晔 武京予
责任编辑	李世琦
美术编辑	吴书平
责任校对	余尚敏
出版发行	河北人民出版社(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印 刷	河北新华印刷一厂
开 本	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
印 张	2.75
字 数	52 000
版 次	2008年9月第1版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
印 数	1—4 000
书 号	ISBN 978-7-202-05012-5/K·900
定 价	6.00元
版权所有	翻印必究

目 录

姚雪垠：“无止境斋”永无止境/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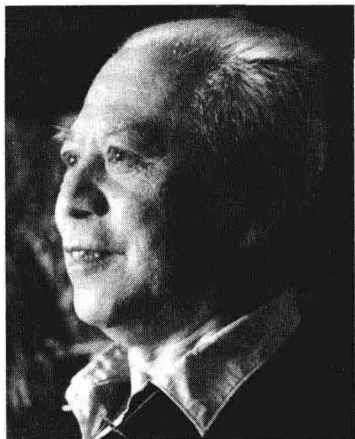
姚雪垠小传/16

姚雪垠的故事/17

文化名人人生智慧丛书

姚雪垠：“无止境斋”永无止境

1995年10月3日，我们在常香玉老师的引荐下，在北京木樨地拜访了著名作家姚雪垠先生，那一年，他86岁。在采访他的时候，我们印象最深的是，在他的书房门框上方，有一个玻璃匾，匾上有4个大字：“无止境斋”。这肯定是他书房的雅号了。通过这个雅号，我们便可鲜明地感受到姚雪垠那永无止境的奋斗精神。永无止境，便是“无止境斋”的灵魂，也是斋主一生的真实写照。



永无止境的姚雪垠

一、《李自成》的构思源于开封河南大学

河南大学是我读研究生时的母校，我在这所美丽、具有悠久历史的学校，工作、学习了三年时间。由于姚雪垠先生也曾求学于此，所以，我们的话题自然从河南大学谈起。



1995年10月3日，作者蒋晔（右）与姚雪垠先生合影留念

他讲：“我这一生的成就很小，但是论起这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成就，我不能忘记在河大预科两年的学生生活。这是我一生道路开始的地方。

“1929年春天，我不满19岁，从河南邓县，来到了当时的省会开封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我结束了浑浑噩噩的少年生活，开始有意识的学习，也有了自己的追求。这所学校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野。”

我们问他全新在什么地方？他告诉我们：“河大两年，我在几个方面获益不浅：一是阅读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，初步掌握了一些关于历史唯物主义、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知识。二是阅读了‘五四’以后的新文学作品、苏联作品和文学理论读物。‘五四’新文学运

动给了我第一次思想启蒙，而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文学运动又给了我第二次思想启蒙。三是在河大期间，读了梁启超的《清代学术概论》等晚清学者的著作，清代朴学家的治学精神、方法和态度，给我以极大的影响。

“我在河大就读的年代，是国内阶级冲突最为激烈的年代，全国学生的抗议浪潮此起彼伏。我和同学们一起，积极参加学潮委员会组织的活动。1930年，反动当局以‘共党嫌疑’为由，将我逮捕，因查无实据，4天后取



《春暖花开的时候》出版时姚雪垠1944年留影。

保释放。1931年暑假，我又因参加政治斗争和学潮，被学校以‘思想错误，言行荒谬’的罪名开除学籍，大学的学习生活至此结束。虽然我在河大只度过了两年的学习生活，但这却是我一生中的关键时期，我永远不能忘记这短短的两年时间，给我的深刻政治思想教育和人格锻炼，对我以后的学习起了启蒙和引路作用。”

我们问他什么是启蒙和引路作用？他说：“在河大期间，对于我来说，最具有意义的是处女作短篇小说《两个孤坟》的发表。当我到报馆领到了《两个孤坟》的稿酬五毛钱时，我的眼睛顿时发亮了。五毛钱，这是一个最不起眼的数字，可是，对处于生活困境中的我来说，却是一笔不小的收入。五毛钱，我可以在地摊上美

美地喝几碗热气腾腾的绿豆面丸子汤；五毛钱，这是我几天的生活费呀。五毛钱带给我的，不只是经济上的接济，更重要的是对我从事文学创作的及时鼓励，精神的安慰。从此以后，我一生都未脱离文学的航道。可以讲，河大两年，为我以后的创作做了初步的准备。

“最早接触李自成材料，是在1931年暑假离开河大后，那时，我仍然不断往来北平、开封之间。利用寒假，回开封探亲，看望住在岳父家中的妻子，我还经常到河南省图书馆（今开封市图书馆）读书。正是在这里，我意外地发现了记载李自成3次进攻开封的两本书，一是李光璧的《守汴日志》，一是周在浚的《大梁守城记》。这两本书，是我接触明末农民战争史料的开始。正是从这里开始，我已经隐约地出现了创作《李自成》的意识萌动。

“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开始广泛搜集有关的历史资料，其中包括明清有关人物的重要活动、重要战役、典章制度和风土人情。为此，我一一做了索引，分门别类，抄成卡片。这项基础工作做了很长时间。你们来看看。”

我们跟着姚雪垠先生走进他的创作室，只见卡片柜靠墙而立，卡片柜有10个抽屉。姚先生让我拉开一个抽屉，只见里面的卡片整整齐齐地排列着，每个卡片上都密密麻麻、简明扼要地记载着某一个历史事件的梗概和所引用的文献。可以讲，没有这些卡片，没有这些大事索引，就不可能有《李自成》这部文学巨著。

“姚老师，您构思《李自成》是在新中国成立前，

真正动手写作是在新中国成立后。这是为什么？除了资料上的准备需要一段时间外，还有没有其他原因？”

姚雪垠说：“有。新中国成立前之所以对写《李自成》之有兴趣，而不能真正去写，有几个原因：一是因为当时我的生活没有保障。二是因为要写好一部长篇历史小说，需要搜集很多资料。这个过程很费时间。第三个原因是最主要的。在新中国成立前，我还没有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，对于农民起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认识很肤浅。新中国诞生后，我这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才逐步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，才能对头绪繁杂的历史资料进行分析判断，去粗取精，把握实质，从而形成了《李自成》的主题思想。正是这样，我带着对李自成及其将领们、士兵们的深厚感情，塑造了一个个英雄形象，写出了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。我在写《李自成》时，常常被自己构思的情节感动得热泪盈眶，不得不停下笔来，等心情稍微平静之后，再继续往下写。你想，我为什么能和农民起义的英雄们同呼吸、共脉搏？我为什么为英雄们而痛哭？这都是因为我真正理解了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的革命性。农民为什么起义啊？还不是被压迫、被压榨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才起来造反吗？正是这些造反把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重新调整一遍，调整到对生产力发展有利的方向上来。”

“您为什么对创作历史小说有这么大的兴趣？我听说您还想写一下太平天国的历史？”

姚雪垠讲：“我青年时代就特别喜欢读历史，总希望自己将来成为一个历史学家。我读的史书很多，对中

国历史和古典文学有过广泛研究。这就为我写作历史小说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

“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，即从什么时候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，几十年来学者们为此争论不休。中国学者有两派观点：一派主张从西周开始中国社会就进入了封建社会；另一派认为到了东周，中国社会才进入封建社会。我从青年时代就很关注这个问题，比较各种学说。我比较赞同范文澜先生的‘西周说’。但我又认为，中国幅员辽阔，各地发展很不平衡，有的地方直到战国时期甚至秦汉以后才进入封建制。我是一个‘调和派’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中华民族的封建文化，在西周乃至以后很长的一个时期内，对当时周围其他民族而言，无疑是一种新兴的进步文化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。这种文化具有强大的同化作用，其他民族可以用武力高压统治汉民族，却征服不了汉文化，最终都被先进的汉文化同化。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历史规律。

“我除了喜爱历史之外，也很喜欢文学创作。1937年5月，我从北平回到开封，在中共河南省委领导下，与王阑西、范文澜、嵇文甫创办《风雨》周刊。1941年在太白山主编《中原文化》刊物。1942年冬到重庆，我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，并担任该协会创作研究部副部长。1945年在四川任东北大学副教授，后在上海任大夏大学副教务长、文学院代理院长。这期间，我写了很多作品，主要有：《战地书简》、《红灯笼故事》、《四月交响曲》等短篇小说集，《牛全德与红萝卜》、《戎马恋》、《新苗》、《重逢》、《春暖花开的时

候》等中、长篇小说，后来还有《长夜》等。这些文学实践对写 300 万字的 5 卷本《李自成》大有益处。”

二、我不能停止长征

《李自成》这部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，持续时间如此之长，我们估计，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罕见的。如果从 1941 年姚雪垠开始搜集资料算起，直到 1999 年他去世为止，创作持续了近 60 年；如果从 1957 年他 47 岁开始写作算起，创作持续了 42 年。生命只有 89 岁的姚雪垠，竟然用了半辈子的情感倾注其中，可见其坚忍不拔的毅力。1999 年春天，《李自成》第五卷、第六卷书稿校订工作全部完成，将近 100 万字，中国作家协会将其定为国庆 50 周年 10 部献礼作品之一，在六七月份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，并同时出版他 22 卷的文集。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的姚雪垠刚刚松了一口气，便撒手西归。其实，在他的心中，他很想写一写太平天国的悲剧等等，可以这样说，他有永无止境的创作计划，他希望的生命终极，是在永无止境的事业中，突然划上句号。这是姚雪垠的安乐死方法。

姚雪垠说：“改革开放前，这部小说的创作主要是被政治运动耽误了。形势好了，我又上了年纪，写起来慢多了。1957 年我在《文艺报》上发表了《打开窗户说亮话》等几篇文章，被打成了‘极右派’，到 1979 年才平反。在 1957 年‘闭门思过’的日子里，我给自己鼓劲，坚决不自杀，不灰心丧气，决定开始写《李自

成》。我是一边痛哭，一边悄悄写这本书的。为掩人耳目，我用一份写不完的‘检查’，遮掩着一叠叠书稿。

“我这个人的特点就是，一旦下了决心，就作背水之战，有进无退，不管多么艰难困苦，决不半途而废。我是打不垮、压不扁、吓不倒、拉不转。那个时候，为了实现特殊状态下的写作，我就特意买了一本仿牛皮纸的活页夹子，用蝇头小字在窄行的活页纸上进行创作。一有空，我就沉思默写，进入李自成的世界，这时给人的印象，我好像是在专心地写反省材料。听到脚步声，我便很快地将活页夹子合上，危坐不动。进来的人问我写什么？我便回答：写检查材料。等来人走了，我再打开活页夹子，继续写作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从1957年10月到1958年8月，用这10个月时间不仅写完了《李自成》的第一卷，也将第二卷写出了一部分。虽然那是仓促写成的草稿，但这是后来整理加工的基础，有这个基础非常重要，倘若没有它，后来的《李自成》就永远是一句空话。后来我被下放到汉口郊区东西湖农场监督劳动，在这里劳动改造的‘右派’，只准干体力劳动，不准有别的任何选择。但我依然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惦念着《李自成》第一卷的草稿，常常一边劳动，一边默默地在心中推敲《李自成》，丰富《李自成》，修改润色《李自成》，然后利用中间休息时间，偷偷地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。晚上和夜里是我的黄金时间，我躲在蚊帐里，守着电石灯，把白天想到的改到第一卷的草稿上。那时我已经是半百的人了，我们修公路，挑塘泥，运砖石，干的都是重体力劳动，我犯了急

性关节炎，不仅不能走动，就是坐也坐不住了，我拄着双拐，行动非常艰难，这才批准我回武汉看病。我回到武汉作协，住进一间空房，房内只有一张单人床，一把椅子，一张三屉桌。我悄悄地住了下来，根本没去医院诊治双腿，而是利用这看病的机会抓紧整理《李自成》第一卷的草稿。到了1960年，中央对‘右派分子’的政策开始有了一些松动和变化。这年10月我被宣布‘摘帽’，我才从地下转到地上，到1961年夏天将《李自成》第一卷整理完毕。

“正当我准备继续完成《李自成》第二卷的写作时，‘文化大革命’开始了。先是大字报、小字报，接着就召开群众大会声讨《李自成》是‘反党反社会主义’的大毒草，声言要打倒姚雪垠这个‘牛鬼蛇神’、‘摘帽右派’，要拔掉《李自成》这面黑旗。我面临灭顶之灾。就在这关键时刻毛主席向我伸出了救助之手。如果不是毛主席亲自出来说话，不仅《李自成》不存在了，也许我姚雪垠也不存在了。但毛主席怎么说的，在什么场合说的，我并不清楚。粉碎‘四人帮’以后，我写信给王任重同志，王任重把事情发生的前前后后写信告诉了我，才知道发生在1966年的‘最高指示’的前因后果。那是1966年7月中旬毛主席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，看到王任重同志列席，毛主席把他叫到身边，对他说：姚雪垠的《李自成》第一卷的上册我已经看了，写得不错。你赶快通知武汉市，对他加以保护，让他把书写完。第二天早晨，王任重即打电话向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传达‘最高指示’。武汉市委

根据‘最高指示’的精神，对进驻文化系统的工作队作了特别布置——保护姚雪垠和《李自成》不受冲击。

“就是这个原因，我才未被揪斗游街，殴打关押，《李自成》的原稿，以及大量藏书和长期积累的二万多张读书卡片，未被查抄，免遭损坏。当时我在‘五七干校’，利用每天放猪放牛的劳动间隙充实修改《李自成》的第二卷稿。白天我把猪和牛赶到野地里放养，自己坐在一旁写《李自成》，遇上刮风下雨便提着一盏马灯躲在牛棚里写。晚上回到集体宿舍，也是争分夺秒，在别人入睡以后，我爬起来，点上油灯，伏在床上写《李自成》，写累了，就到院子里打两套太极拳，回来再写。天天如此，从不间断，即使每天只写上三、五百字，也决不放弃。”

1975年，65岁的姚雪垠为了摆脱干扰他写作的各种精神压力，使创作继续进行下去，他在湖北省给毛主席再次写信，请求毛主席再一次伸出援助之手，支持他把《李自成》写完。这封信他寄给宋一平，然后再转给胡乔木，再转送给第一副总理邓小平，邓小平转呈毛主席。毛主席立即表示支持，用粗铅笔在报告上批道：“印发政治局各同志，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、三卷至五卷。毛泽东十一月二日。”这样姚雪垠才得以脱身，从武汉来到北京，专心致志地写《李自成》。

姚雪垠说：“我每天凌晨三时左右起床，一直写作到中午，从没有节日、假日。1976年地震那天，别人是在梦中被震醒的，而我早已起来写作了。前前后后用了近八个月的时间，反复地进行修改、加工、润色。

1977年第二卷出版后，一炮打响，轰动各界。正是这一卷，使我荣获了首届茅盾文学奖。

“1977年《李自成》第二卷完成后，为加快《李自成》出版周期，国家专门给我配备了两名助手，并且改为口述录音方式。我在录音前都要列出详细的写作提纲，细到某一章某一节的情节如何，对话怎样。然后每天凌晨趁夜深人静之时，根据写作提纲用录音机录下自己口述的内容。天天如此，每天都要录四五个小时，然后再由助手根据录音去整理。就这样不到3年时间，我完成了《李自成》第三卷，1981年出版，我已经71岁了。《李自成》第四、五卷的创作也采用了这种方式，到了80年代中后期基本拿出了这两卷的口述录音稿，到这时，可以说这两卷已基本成稿了。”

老作家秦牧是这样评价他的：“姚雪垠致力写三百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《李自成》，单是这种意志和毅力，就很令人敬佩。这种精神，着实了不起！”这种了不起的精神，在姚雪垠《八十愧言》中表达的更为精彩：“我今年仅仅八十整寿，离百岁还很远呢。我对追求事业的热情依然未减，艺术思维能力也未衰退，我不能停止长征。具有五六千年文明，三千多年光辉文学的伟大祖国，需要我继续服务。假若我写到九十多岁，或将近百岁，忽然医生告诉我说：活不多久，不能再写作了。我不是想着我这一生曾经为祖国人民写过了多少作品，而对医生点点头，表示感谢，然后轻轻叹息一声，在心中惋惜地说：‘可惜呀，我还有一些写作计划不能完成了！’”

三、决定历史发展趋势的力量

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是一个悲剧式的历史人物。他经过十几年的浴血奋战，终于推翻了腐朽的明王朝。然而不幸的是，他进驻北京 42 天后就不得不退出，一败千里，一败涂地。这是为什么？

当我们问到这一问题时，姚雪垠说：“李自成起义军打垮了明王朝的腐朽统治，在一定程度推进了社会的发展。他的坚贞不屈的光辉品质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，代表当时农民利益的革命行动，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。

“李自成的一生是悲壮的一生，他是一位悲剧英雄。他失败的主要原因有三个：一是没有建立根据地；二是进北京后没有解决好腐败问题；三是在一些重要政治、经济政策上出现了严重问题，对革命产生了不利影响。李自成进入北京后，本来可以利用自己强大的政治和军事优势，争取不愿意向清军妥协的明朝文臣武将以及广大爱国儒生、社会各阶层人士，以对抗清军。遗憾的是起义军不顾一切、不讲策略地杀害了很多明朝官员，同时进行‘追赃助饷’。另外，嗜财贪色的腐败现象迅速滋长。一些有识之士提出的收人心、礼葬崇祯皇帝、建立根据地、以田赋制度取代流寇式吃大户的主张都没有被李自成采纳。而清军则紧紧抓住了李自成的这一弱点，十分重视笼络降清儒生，号召明朝官员到清政府里做官，致使吴三桂带领 6 万清军骑兵入关，李自成败走

北京城。由于李自成没有建立后方根据地，所以他兵败如山倒，一发不可收拾。

“明朝灭亡以后，明朝遗民和清代封建士大夫都对崇祯帝抱有同情之心。历代的亡国之君，或是荒庸淫乱，或是胡作妄为，或是不理朝政，或是糊涂、昏庸、懦弱、年幼无知、大权旁落等，而崇祯皇帝则不然，他亲掌朝政，刚毅有力，力图振作，与历代亡国之君迥然不同。然而，到了明朝末年，政权已经十分腐朽，决定这个王朝必然灭亡。不管谁做皇帝，只能使亡国的时间延缓或加速，并不能力挽狂澜。由于崇祯皇帝不同于其他末代皇帝，所以明朝才在他手上维持了16年时间。这个时间不短啊！愈是崇祯百般努力而未果，愈显示出历史的发展是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这个规律。这是历史的必然。人民要造反，要革命，成了这个时期的斗争主流。所以，决定历史发展趋势的基本力量还是人民群众。水可载舟，也可覆舟，民心向背决定历史方向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反复印证了这个道理。”

我们问姚雪垠如何看待历史小说中的历史问题？他讲：“三中全会以来，我们国家历史小说大量出现，但不懂历史的小说太多。像我们这么一个传记文学、历史文学都很发达的国家，我们有作家懂历史的传统，但目前的情况很不好。譬如说湖南有个作家写的历史小说，竟说酉时太阳很高，这是缺乏生活常识，酉时明明是深夜，怎么可能太阳很高呢？再比如小说中说袁世凯向荣禄告密，说谭嗣同要包围颐和园捉拿慈禧，荣禄专门设了个跳舞会来招待袁世凯，这也是不可能的，那时怎么